■ 齐鲁名士

东平王氏一门两进士 梯门镇残存东王林

王宪：宁可欺君 绝不扰民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本报通讯员 陈淑锋

3月4日，东平县梯门镇西梯门村。初春时节，村西农田中作物犹未返青，旷野中黄土裸露。在西扈山之阳，一座带有神道碑的大型林地，在开阔地赫然而立。

“云蒙迁居，东原发祥”，墓葬门洞上书“少保茔”，彰显一个家族过往的荣耀。据东平县史料记载，梯门王氏始祖王海，于明朝初期从青州府迁居梯门。王宪和儿子王汝孝，都是进士出身，被后人赞为“父子二进士”，乡间至今流传着他们的佳话。

皇权交替之际 两赴南京迎嘉靖

梯门镇副镇长王笃兴介绍，东平出过四位尚书，王宪是其中之一。王宪墓葬今存封土堆高1.5米，宽6.5米。墓前一方建于明代的墓碑，上有“光禄大夫勋柱国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赠少保谥康毅荆山王公墓”题字。村民王旭镇指着墓后不远处三座线条柔缓的小山说，这块地方风水极好，背后的山连起来，远看像一座“太师椅”。

墓前神道碑曾在“文革”中被摧毁，后被王氏后人重新立起。原有石门三架，现残存一架；由南向北依次有望天狮一对，石虎、石羊、石马、石人各一对，造型高大，雕刻精美。据光绪版《东平州志》载，王宪墓修建于嘉靖十九年，占地二百余亩，林内古柏苍翠，遮天蔽日，“有神道碑”。

东王林中文官石人 吴文峰 摄

东王林神道和现存的一道石门 吴文峰 摄

今王宪墓石碑上，墓主人生平清晰可见。王宪字维刚，东平县梯门村人，明弘治三年中进士，历官阜平、滑县知县，大理寺丞，右佥都御史。他奉旨巡抚辽东，在应州抗敌有功，封户部右侍郎，赐其子锦衣世百户；又改府陕西回朝任兵部右侍郎；后因平盗乱有功，又赐锦衣。明武宗朱厚照南征，令王宪督理军储，他恪尽职守，调度得当，凯旋升为兵部尚书。

公元1521年3月，武宗病死。在皇权交替之际，王宪因办事忠诚稳妥，被委以重任。由于武宗没有留下子嗣，又是单传，因此皇太后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决定，由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书信交由王宪，奔赴南京请朱厚熜继位。

王宪独身前往，一路星夜兼程。大约半月后，王宪赶到南京，朱厚熜见只有书信并无皇帝印玺，认为王宪戏耍于他，当场大怒，令人责王宪四十板，赶出南京。

王宪回到京师，皇太后亲授印玺，王宪重返南京。朱厚熜二见王宪，王宪呈上印玺。厚熜收印后，为辨真假，问王宪当时如何接过印玺，王宪回答说：“背后接印。若不信，印摔掉一角为证。”朱厚熜见王宪如此忠诚，当即口谕为王宪修王府四十里。

拒建尚书府 村名有迹可循

朱厚熜即后来的嘉靖皇帝。在南京歇息数日，王宪陪朱厚熜回京，一路不离左右，时而谈论朝野诸事，时而进献治国安邦之策。此间，朱厚熜特意叮嘱王宪到其家乡时禀报，准备兑现之前许下的承诺——划四十里为其建尚书府。

消息一经传出，地方官员便在今县城东十华里处，建立了两个瞭望驿站，了解圣驾行踪。在县城驻地派大内高手驻扎，并在今县城北十华里处拟建寝宫。王宪对此不以为然，心中思虑如果修四十里王府，虽然自己耀祖光宗，但周围的百姓却要遭受磨难，不忍心惊扰。

进入山东境内后，朱厚熜多次询问是否到了王宪家乡，王宪几次谎称，还有两三日路程。待走过家乡梯门村四十里后，方报于朱厚熜：“罪臣该死，罪臣犯了欺君之罪，圣上已经离罪臣家四十里远。”

朱厚熜龙颜大怒：“王宪欺君罔上，罪该……”朱厚熜尽管很生气，但不想失去这位忠臣，遂道：“王宪你欺君罔上，罪该穷八辈子！”王宪听之，急跪奏曰：“万岁让我穷八辈，我的后辈如何维持生计呢？”朱厚熜道：“朕特封你家林上的树，砍掉后能再长出来，后世可卖柏树度日。”王宪听后，叩头谢恩。

在东平一带，虽然没有建成王宪尚书府，但这一传说仍有迹可循。为迎圣驾的两个瞭望驿站所在地，今称为望驾村、顾驾村；县城驻地大内高手驻扎的地方，称为护驾村；县城北拟建寝宫的地方，称为驻驾村。“王家林的柏树砍了再生”之说也流传至今。

据当地老年人回忆，王家林的柏树与其他地方的柏树确实不同。砍后柏树又从底部多处发芽，几年后就长成大树，且主干笔直，枝叶茂盛。

“蚂蚱兵”制胜 父子不忘龙山书院

王宪因保驾有功，一直为嘉靖皇帝殿前宠臣。有人嫉妒，在皇帝面前谗言，王宪有不轨之举，被降职为三边总制，治御边境。时逢西部边境起事，嘉靖皇帝命王宪带兵五千前去御敌。

这段出征之行，被民间传为一段神话。王宪领旨西征，行数日到达边境，安营扎寨。到西关后，率部将察看地形和敌情，远观敌阵犯兵众多，而自己仅率五千精兵，难以匹敌，便回军帐苦思良策。

正苦闷时，有一老翁求见。王宪忙离座出迎，只见老翁年约六十，花白头发，红光满面，身着紫色袍裤，手持竹拐杖，步入帐中，问王宪如何应敌，王宪答曰：“敌多我数倍，除背水一战，别无良策。”

老翁笑道：“总制不可如此，老夫可助你迎敌。”王宪道：“不知您有何妙计？”“天机不可泄露，只是你明日午时，擂鼓叫战，大鼓三军士气，看准时机，乘胜追击即可。我必来相助。”老翁说罢，独自出帐而去。

王宪惊然，夜不能寐。次日午时，宪布阵叫战，犯敌乘骑直奔王宪军阵。未及交手，忽见狂风大作，满天蝗虫如流云飞驰。战马双目难睁，马失前蹄，犯军纷纷落马，人马互相践踏，死伤无数。王宪急令出击，大败敌兵。

战后，老翁又出现在王宪帐中。老翁道：“总制获胜，此乃天意。只是我那儿孙们助你作战未能饱食，你可否让它吃顿饱饭？”王宪答曰：“宪没齿难忘，只是由于战乱频繁，百姓甚是艰难，请您带着儿孙们，到东平州我家封地去饱食吧！”老翁听后说：“谢总制美意。”话音未落，人已消失踪影。众将大惊，王宪自语：“神助我也。”

王宪班师回朝，世宗(嘉靖皇帝)念他破敌有功，凯旋归京后加封为兵部尚书。王宪为祭蚂蚱助战，林后百亩良田从此再不耕种，俗称“蚂蚱地”。据村民称，在王家林一带，至今仍可见“铁头蚂蚱”，它们当年是否曾助王宪作战，今已无从查证。流传百年的乡野传说中，却能窥见百姓对好官的崇敬爱戴之情。

数年后，王宪以年老辞归，死后赠官少保，谥康毅。明世宗皇帝下谕致祭：“卿以高年凤望，台省元老，出入累朝，险平一致，嘉名茂绩，简在朕心。”王宪之子汝孝，嘉靖六年进士，官至河南右布政使、顺天巡抚，助守蓟州战功显赫，官至礼部郎中改翰林修撰。汝孝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为官清廉，“历屡南北皆有声迹”。

王宪和王汝孝曾先后就读于龙山书院。王汝孝遵父嘱，在龙山书院修碑撰文，感谢母校培育。碑文曰：“清河泱泱，龙山苍苍。桃李天下，母校永光。”

·相关链接·

龙山书院 荫东平学子

□ 卞文超 刘凯思 整理

明清两代，东平人才辈出，龙山书院功不可没。龙山书院位于山势峻拔、风光如画的龙山之阳。它历经元、明、清三代，可谓桃李满天下，人才遍域中。

书院原为封建时代名儒学者召集青年讲学的地方，以研究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为主，有时也兼论时政，对学术思想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至明清时，多数书院沦为准备科举的场所。

东平龙山书院曾进行两次移建。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龙山书院遭火灾，遂在州城内北门里路西重建龙山书院；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东平遭水灾，书院受损，全州绅民捐资，将书院移建于小东门里(现东平一中校址)。新建书院，规模宏敞，有讲堂、斋室、伙房、宿舍、办公房、藏书阁等房舍百余间。光绪二年(1876年)，又在书院东侧新建试院(亦称考棚)、堂室、号舍五十余间，为童试(考秀才)场所。

东平龙山书院由州训导署领导，设书院董事会。董事会成员由本州德高望众的知识分子组成，公推书院负责人一人，元、明两代称山长，清代称院长。书院章程规定：“书院为作育人才之所，而山(院)长即为人才模范。书院山(院)长由地方官绅自行延访品学兼优之人充任，无论何人不得徇情压荐。如山(院)长不实心教诲，即当辞谢，另请名师，一切情面嘱托亦不允从。”

书院教习(教师)由山(院)长延请当地学行素著之员生、举人、进士充任。下设监学一人，负责生员管理；首士一人，负责办理生员生活事务；学长一人(在众生员中选举产生)，负责办理生徒有关学习事宜。

书院不仅有朝廷颁发的《书院章程》，还有各自的院规。咸丰九年(1859年)，进士蒋作锦(州城西南大渔营人)撰写东平龙山书院条规16条，规定了院长、主讲、教习授课和生徒学习、生活制度及奖惩条例，以及书院经费管理和使用范围、手续等，各项规章制度的要求都非常严格。如关于生徒学习、考试及生活方面的规定：“诸生必须服从院规。对违犯院规、不敬师长、荒废学业者，进行严格管教，乃至鞭笞和除名。”“诸生住院，饮酒、赌博者，查出重责不怠，院中并禁闲人游戏。”

对书院教习亦有明确规定：“为人师表，言行一致，处处做诸生模范。在教学上，要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夫子之言为座右铭。”书院经费，主要来源于书院学田收入。

远去的西夏王国

在我国西北城市银川的郊区，贺兰山脚下，一片荒芜的沙野上，奇迹般地伫立着上百个或圆或方的黄土堆，其中有些土堆的样子和古埃及的金字塔有几分相似，人们把它们叫做“东方金字塔”。

银川是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在汉语里，银川的意思是银色的平原。

史书记载，在公元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期间，西北一带有一个叫西夏的王国，首都就在银川。那时，这里耸立着金碧辉煌的宫殿，集市上热闹非凡。

被称为“东方金字塔”的西夏陵墓

□1970年的初春，一位陕西考古工作者乘车经宁夏前往内蒙阿拉善的途中，看到距银川市不远的贺兰山下，分布着一片高低不同的黄色土丘，这一信息当年并未引起宁夏考古界的重视。

这片黄土丘，当地的老百姓一直称它为昊王坟，老百姓所说的昊王坟的“昊”字就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昊”。许多年来，就这片陵墓群的归属，史学界和考古界从没有过明确的定论。

1971年冬天，宁夏驻军某部为完成战备训练任务，在陵区内开挖战壕，当挖到地下一米多深时，翻出了不少刻有奇怪文字的残碑碎片。宁夏博物馆考古工作队的队长钟侃带人赶到现场，当看到那一块块残碑上的文字时，钟侃震惊了，这是早已消失在历史中的西夏文字啊。

仅仅凭着残存的文字，就可以肯定，这里确实是西夏国的遗址。后来，人们又在明代的史书上发现，贺兰山下埋葬着西夏国的几代国王。由此，考古学家初步断定，这里分布着的遗址就是西夏王陵。

西夏王陵的发现，让人们充满希望，也许王陵能告诉我们许多关于这个王国的往事。

□1972年夏天，挖掘考察工作开始了。据《宁夏嘉靖新志》记载：贺兰山下西夏王陵的建造形制是仿河南巩县宋陵而做。但在之后的整个挖掘考察过程中，却揭示出了与宋陵越来越不相同的内容，这就如西夏文字，初看像汉字，细看一个不认识。

在东西宽4.5公里、南北长10多公里、总面积近五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排列着九座大型的帝王级陵墓和两百多座大大小小的陪葬墓。

勘察结果表明，每座陵墓的形制大同小异，四周都筑有夯土城墙，城内分前、中、后三个部分，组成了一座座封闭式的庭院。

人们考虑再三，决定试掘地表没有明显盗洞的编号为6号的陵墓。从1972年开始，挖掘工作持续了三年时间，一个深24.6米、长49米的墓道终于被清理出来。

通向地下宫殿的道路越来越近，人们的心情开始激动了，西夏的国王会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遗产呢？

然而，进一步的深入却带来了深深的失望。

一座豪华的地下宫殿竟然只留下为数不多的物品，它们都被埋在淤土或堆土中，大概是盗墓贼不小心遗落的。

幸好地面的文物清理得到了一些收获。

在对西夏王陵的发掘清理中，最早出土的是三尊石刻雕像，它们既像人，又像兽，面目狰狞。

此类石雕在国内属首次发现，当时并不清楚它们最初的作用与功能。之后，随着发掘清理范围的扩大，出土数量的增多，其中一尊石雕上出现的西夏文字才道破了天机。原来这是承载石碑刻文的人像石碑座，也叫碑雏。

关于石碑座的用途仍然存在争论，有人认为它们是用来驮石碑的。石碑上记载着国王的一生事迹，也许还有功过的评价。

但是，所有的墓碑都已不知去向，只有大量的残片散落在墓地里。

形状特异的石刻雕像

当清理7号陵墓时，一共出土了1775块刻有西夏文字的残碑片。西夏文学者李范文被指定对残片进行拼对，一个由16个字组成的残碑，最终成为揭开这片陵墓群神秘面纱的物证。这16个字翻译出来以后，就确定了这个皇帝是西夏第五代皇帝李仁孝。

这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在少量的16个字中，竟然明确地找到了陵墓主人的线索。直到今天，寿陵仍然是九座西夏王陵中惟一一座可以确定墓主身份的陵墓。

发掘成果虽然不尽如人意，但王陵庞大的规模足以说明，西夏国曾经拥有强大的国力和辉煌的过去。

□大概涉足过西夏王陵的人都有过这种感觉，那些被称为陵的黄土包和平时见到的坟丘没什么两样，只是显得高大一些而已。其实不然，根据专家考证，它原本的形制并非如此，而是一个个挂满琉璃的宝塔式建筑，名为陵台，又称封土，属陵城内的主体部分。

传统的丧葬习俗一般墓穴应当是在封土的正下方。可西夏王陵的墓穴并非置于封土之下，而是远在封土正前方。

西夏王陵的基本形制和宋陵有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西夏王陵内的地面建筑大多都是塔式风格，这与中原地区的唐陵、宋陵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西夏王陵的陵台不居中，偏离陵园的中轴线，位于陵城的西北角。

就西夏王陵主体建筑偏离中轴线的现象，专家们有多种说法，多数认为我国古代许多游牧民族崇奉萨满教，他们认为：中间乃“神灵”之位，人应当有所避讳。即便是君主以及他死后的陵墓也不能占据正中，因为那是主神的方位。

但也有人推测西夏王朝起源于西北，又强盛于西北，在它看来，西北是吉祥之地，所以它的陵台偏向西北角有图吉祥之意。

皇家陵园的石像生自东汉创制以来，其位置均列于陵园正门外的神道两侧，成夹道之势。但早已随着陵园的毁坏而消失的西夏王陵石像生，根据发掘的痕迹表明，初建时则全部摆放在陵城内，这更为唐陵、宋陵所不见。

就目前发掘的情况看，西夏王陵的陵寝墓室均是人为掏制的土洞墓穴，无一砖石结构。更令人不解的是，在他们简陋的墓室内很少发现有贵重的陪葬品。

在对西夏王陵的整个挖掘清理过程中，考古工作者一直有个从未实现过的心愿，那就是希望能打开一个完全没被盗掘过的陵墓。

1977年2月，机会来了。他们怀着这个心愿将目光聚焦在了陵区内的一座陪葬墓上。

7个月后当墓门终于被打开，突然出现在墓室斜角的盗洞，一下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失望了，这仍然是一座没能逃脱劫难的墓。心灰意冷的考古人员只得进行一些常规的清理工作，可几天后奇迹出现了，一尊造形精美的鎏金铜牛从黄土和沙石中慢慢地显露出它的原形。

鎏金铜牛

这尊已被国家定为一级文物的鎏金铜牛身长1.2米，体重188公斤，通体鎏金，造型生动、形象逼真，在国内属首次发现，是一件无可置疑的国宝级文物。

与鎏金铜牛一起重见天日的还有一件与铜牛大小相近的石马。

□2000年，人们开始对编号为3号的陵墓进行保护性发掘。这项浩大的工程直到2003年才基本结束，清理的发掘面积超过三万平方米，出土了14万件建筑装饰构件。由于出土时大多呈碎裂状，几乎所有的构件都需要修复，经过清理、拼对、整形、填补等几道程序，人们得以看到几个世纪前党项人的作品。

2000年5月，考古人员在对3号陵墓的陵城东南角进行清理时，在地下50厘米处发现了一个直径10多厘米、具有佛像特征的实心灰陶佛头。

当年9月，地面清理转移到了该陵的东门，就在这里，一个大体完整、带有翅膀、造型独特的佛像被清了出来。当时在场的宁夏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杜玉冰女士根据自己学术上的积累，确认此物名为“迦陵频伽”。

“迦陵频伽”作为建筑构件出现在西夏王陵，说明唐宋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许多被赋予神的化身的崇拜物已走出佛经故事，作为一种艺术题材被广泛应用。

带有翅膀的佛像

在西夏国统治的时期，这里是佛教的世界，到处耸立着各式各样的佛塔。

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西夏人对佛教的尊崇，佛像是西夏艺术的象征。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博物馆里，保存着在内蒙古黑水城发现的一尊双头佛像，它称得上是世界佛像的精品。

佛教融进了西夏人生活的每个方面，在西夏王陵出土的许多建筑构件实际上都跟佛教信仰有关。

甘肃武威一带曾经是西夏王国的领地，在这里也发现了不少古王国的遗物。两百年前，就在武威这座大云寺内，一位前来游历的学者发现一块石碑上刻着一些古怪的文字，看起来很像汉字，但博学的学者却一个字都不认识。绕到石碑的背后，看到了汉字，根据上面记载的年号，学者终于弄明白，原来石碑正面是失传已久的西夏国文字。

就在武威的西夏文石碑被发现后的一个世纪，俄罗斯的探险家柯兹洛夫又在黑水城发现了大批西夏文典籍，西夏文成为一门新兴的国际学问，各国学者都试图破解它的含义。迄今为止，一共发现了六千多个西夏文单字。

从外形上看，西夏文和公元前二世纪左右的汉字小篆很相似，无数的线条叠加在一起，写起来比小篆还麻烦。西夏人肯定没有想到，正是西夏文字的繁复特性为日后的失传埋下了祸根。

西夏文字在创立后经过近一百年的发展，渐趋成熟，大量的西夏书籍出现了。它们中有一部分是用手工书写的，一部分属于雕版印刷品，还有一些却令人疑惑。

在银川，宁夏考古所的牛达生则仔细研究了另一本西夏文佛经，他认为这本佛经是木活字的印刷品。边框的不整齐和倒字的出现，是活字印刷的最好证据。

西夏文书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这进一步证实，活字印刷术最早出现在中国，后来通过“丝绸之路”，又逐渐流传到欧洲。

活字印刷的西夏文书籍

□通过对3号陵的研究，人们终于大致弄清了西夏国王的陵园结构，所有王陵的形制几乎完全一样。

这种形式在古代中国的墓葬中是独特的，西夏人为什么这样设计，现在还没有确切的答案，惟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与西夏人对佛教的崇敬有关。

3号陵的墓主人是谁，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有人根据文献资料记载的墓葬制度，作了大胆的猜测，认为3号陵的主人就是西夏的开国英雄——李元昊。

公元13世纪，中国北方的蒙古草原，崛起了一支无比骁勇的游牧民族——蒙古。公元1224年，蒙古人开始进攻繁华的黑水城。黑水城的军民抵抗了3个月，十万将士几乎全部战死，城市沦陷后，竟然没有一个人投降。

铁木真到死也没有看到西夏国的灭亡。公元1227年，铁木真在征讨西夏的过程中去世。这时候的西夏国也已经耗尽了气力，不久之后，西夏末代国君不得不亲自前往蒙古统帅的驻地投降。

为了完成铁木真的遗愿，蒙古军队进入西夏国的首都后，开始了毫无节制的屠杀和破坏。文明的成果转眼间变成了废墟，更有无数无辜的西夏人被残酷杀害。

延续了190年的西夏国灭亡。

据史料记载，西夏共传位十帝，除最后一任献城投降的睍帝被蒙古军队带到成吉思汗的出生地萨里川祭杀外，其他九位加上开国帝王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父亲李德明都葬在了贺兰山下的皇家陵园。如果是这样，西夏陵区内就应当有11座帝陵才能对号入座。但截至目前只发现了九座。有专家认为第八代、第九代帝王均死于1226年成吉思汗围攻西夏的战乱时期，此时正值国家危难，顾不上造陵。但有的专家对此说法持不同看法。

那么两座找不到踪影的帝王陵到底哪里去了？这也许永远是个历史之谜。

（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供本报专稿）

探索·发现